

蘇聯在日本海及印度洋海權的擴張

洪孟啓

一 蘇俄海權發展的理論及重點

戰後蘇聯擴張海權的努力^①，是基於以下兩個原則：第一、承襲沙俄時代以來尋找出海口的傳統，避免因海上交通被切斷而損及其強權地位；第二、彌補地理位置上的缺陷，即不僅要追求有利的海軍基地^②，同時亦要發展科技，使海軍具有長程之續航力，適應力和高度的戰鬥力。^③

根據蘇聯海軍元帥高希柯夫（Admiral Sergei Gorshkov）的說法，戰後蘇聯海軍的發展大約可以區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一九四五年以後的最初十年，此時在於發展傳統海軍力量，目的在增加水面艦隊與繼續維持沿海作戰（Coastal Operations）的能力，就軍事觀點而言，此乃在協助陸上部隊達成作戰目標（Objectives）；第二階段始於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其重點係全力發展核子動力船隻並擴張遠洋海軍（Ocean-going Navy），目的是要遏阻敵國的潛在攻擊，同時彌補其海外基地的短缺，而以美國喪失核子獨佔優勢為鼓勵蘇俄更形發展海軍的主要轉捩點。^④

蘇聯擴張海權的決心，始於赫魯雪夫時代；不過當時由於「和平共存」政策的執行，其重點放在核子嚇阻能力的加強

註① 「海權」一詞應該給予一個較廣泛的內容，即是除了海軍力量之外，商船隊、科學探勘、船隊以及海軍聯繫、海洋政策等等，均在其內。為了便於討論，本文將以海軍活動為着重點。見高希柯夫（Sergei Gorshkov）著，錢懷源、黃志潔譯，蘇俄海軍的崛起（台北：黎明書局，民國六十四年九月），第一八六頁。
See also Tan Su-cheng, "The Expansion of Soviet Seapower and the Security of Asia," *Asia & the World Forum Monographs*, No. 3 (Taipei: Asia & the World Forum, 1977), p. 3.

註② 高希柯夫認為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之所以失敗，乃在於太平洋水域沿線沙俄無一可泊錨或整補的港口。或許此一歷史的教訓使當代蘇聯海軍以追求有利之海軍基地為主要原則之一。See Sergei Gorshkov, "Navies in War and in Peace,"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 100, No. 3, March 1974, pp. 59-60.

註③ 錢懷源、黃志潔譯，全前引書，第二六一—二九一、二九〇——二九二頁。

註④ Sergei Gorshkov, *Morskaya Moshch Gouudarstva* (Soviet Ministry of Defence Publishing House, 1976), translated by Reuben Ainsztein and Was extracted by *Survival* under the title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Survival*, Vol. XIX, No. 1, Jan./Feb. 1977 (London: IISS), p. 26.

上^⑤。至布里茲涅夫當政，乃改採「彈性政策」，傳統與核子作戰能力同時兼顧，海權思想與海軍任務亦隨之更新。論其改變的原因，可由國際環境的變動與兵器系統的改進兩者加以探尋。就前者言：(一)由於美蘇兩國皆有避免核子互擊的同意願，因之小型或區域性戰爭已不再被認為會引發全面性的核子大戰，於是傳統武器的發展就不可偏廢；(二)美國海軍在越戰時期，顯示出能够有效的支援小型戰爭中的地面部隊，並且也能將之有效的抑制在傳統武器的使用上，因此之故，蘇聯海軍高級將領查赫洛夫(Admiral S.E. Zakharov)等人乃開始討論發展航空母艦、巡洋艦以及海上封鎖的使用及其重要性；(三)一九六七年以阿六日戰爭時，蘇聯藉埃及之助得以試驗其艦隻的作戰能力，並且開始以強大海權插入地中海。^⑥

其次，就兵器系統改進言：(一)核子潛艇的廣泛使用，減少了陸上基地的重要性，相對的却增加了發展世界性海軍的需要；(二)衛星及其他精密武器的使用，於航海上產生了兩種影響，在一方面，使得海洋由海上爭奪控制交通線與阻止登陸行動的傳統性區域，轉變為自潛艇發射導彈飛彈和由航空母艦起飛飛機的理想作戰區域；在他方面，海軍的行動已成爲整個軍事作戰中異常重要的一部分，而海洋也不再是一個天然的隔絕上的障礙。^⑦

基於以上理由，蘇聯決策者相信，未來海權的發展應以摧毀敵方的陸上設施與保護本國領土不受敵方海軍攻擊爲主要目標。當然，這種任務的達成仍有賴於在海面上足以與敵方海軍爭雄的能力，因此蘇聯第二項目標乃是使其海軍具有足以摧毀敵方海軍的力量^⑧。以上兩項目標的提出，說明了蘇聯的海權觀念在於追求核子與傳統兵力兩者之優勢，這也就是前面所曾提到的「彈性政策」的採用。在此一政策下，蘇聯海軍的發展具有以下兩個特點：(1)建立均衡的海軍(balanced fleet spalanisiro-vannyi flot)，(2)發揮海上阻斥(dinial of the seas)的功能^⑨。因此，蘇俄大量製造艦船^⑩，并以核子潛艇，各型軍艦與龐大船團爲重點^⑪。歸結其更新後的海軍任務，計有戰略攻擊、戰略防禦、支援地面作戰以及宣揚國威等四大項。^⑫

海權已成爲蘇聯全球戰略中不可缺少的一環。而海軍角色在核子時代中也已經產生了實質的變化，它不再是單純的海軍，而是變成爲行使全面核子攻防戰略任務中的一種工具了。因此我們如將注意力集中至兩個主要水域(日本海與印度洋)時，便可以立即發現，蘇聯在該區的海軍活動，顯係由海軍逐一建立戰略條件，使之符合蘇俄在戰略設計上的基本要求——改善態勢，俾建立控制——以期鞏固或更進一步完成其海權追求之終極目標。

註⑤ 一般以爲蘇聯加強海軍之決心始於赫魯雪夫。一九五六——一九六二年間，蘇聯全力於核子武器船艦的發展，至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事件之後，方始轉變，而以一九六四年爲轉捩點。See David Rees, "Soviet Sea Power: the Covert Support Fleet," *Conflict Studies*, No. 84, June 1977 (London: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 p. 3, and Robert G. Weinland, "The Changing Mission of the Soviet Navy," *Sovietnavy*, Vol. XIV, No. 3, May-June 1972, p. 130. This article was reprinted from *Professional Paper*, No. 80, Center for Naval Analysis.

註⑥ George E. Hudson, "Soviet Naval Doctrine & Soviet Politics, 1953-1975," *World Politics*, Vol. XXIX, No. 1, October 197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108-111.

註⑦ Sergei Gorskoy,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op. cit.* pp. 25-26. 他認為目前的海洋不但為西方國家提供了發射核子武器的場所，而且無數的島嶼也使西方國家的海空軍可據為基地，以極微的代價便能自由巡弋於海洋，威脅蘇聯。

註⑧ Sergei Gorskoy, *ibid.*, pp. 28-29.

註⑨ Sergei Gorskoy, "Navies in War and in Peace,"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November 1974, pp. 62-67. 在該文中高希柯夫以德國在前兩次大戰單純以潛艇作戰失敗的教訓，作成結論說：「因此，在優先發展潛艇力量之際，也相信我們不但需要潛艇同時也需要各類海面艦隻。」據西方學者分析，蘇聯「均衡」的觀念乃基於四個要點：①核子與非核子任務能力的均衡；②和平與戰時行動的均衡；③船艦形式的均衡；④海軍戰時與平时的揚威活動與時間的消耗上，應儘可能與地面部隊配合，以反應軍事上的均衡。「阻斥」，其意乃阻斥敵方絕對控制海洋的能力，目標在於對現存海上力量挑戰與嚇阻。據高希柯夫和蘇聯海軍將領的意見，認為各型艦隻的使用為海上阻斥的要件。See George E. Hudson, *op. cit.*, pp. 104-107. and William Schneider, Jr., "Soviet General-Purpose Forces," *ORBIS*, Vol. 21, No. 1, Spring 1977, p. 99.

註⑩ Michael McEwre 統計，蘇聯集團各型海面艦隻（由千噸至一萬一千噸），其總數一九六五年為十四（艘），至一九七五年為一〇四。航空母艦（由一萬五千噸至六萬噸）一九七六年為一，一九七七年為三；大型兩棲戰車（四千噸級），一九六六年為二，一九七六年為廿二；彈導飛彈核子潛艇，一九六七年為一，一九六七年為五三；非彈導核子潛艇，一九六五年為五，一九七六年為十五；非核子潛艇，一九六五年為六，一九七六年為廿六。See Michael McEwre, "Western and Soviet Naval Building Programmes, 1965-1976," *Survival* (London: ISS), Vol. XVIII,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76, pp. 206-209.

註⑪ Schneider 分析，蘇聯海軍已改小型海防艦為重型艦以支持海上阻斥的目標，同時其柴油動力與海防潛艇亦改以大型柴油與核子潛艇。此外，基輔號的出現乃反應蘇聯多目標艦隻的興趣。Schneider 進一步以為，倘若蘇聯大多數艦隻均具有反潛與反海面艦隻能力，則對於蘇聯海上阻斥能力，當有添翼之功。高希柯夫主張蘇聯海軍發展之具體方針為：①建造核子潛艇②引入核子潛艇在水下發射核武能力③創發海空軍的海上作戰能力④航空母艦的引介⑤由質上改變反潛能力⑥無線電子遙控武器系統與電腦等使用技術的輸入等等。David Rees 分析，一九六五年蘇聯商船量佔世界第廿六位，一九七六年躍至第六位。Rees 以一九六四年為蘇聯船團真正擴張的起始年，至當年底船數為九〇〇，總噸數（DWT）為六九〇萬噸，一九七五年船數為一六六〇，總噸數為一五四〇萬噸，並估計至一九八〇年底，蘇聯將擁有一千艘，總噸數為一八四〇萬噸。See William Schneider, Jr., *op. cit.*, pp. 102-105; Sergei Gorskoy,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op. cit.*, p. 7; and David Rees, *op. cit.*, p. 4.

註⑫ 錢懷源、黃志潔譯，〈空前引書〉，第二〇一頁。

二 蘇俄在太平洋水域的活動

由兩極性（polarity）的戰略觀點來看，蘇聯正居於心臟地帶，而此一地帶在戰略上具有着重要影響力的地位^⑬。因此，蘇聯的遠東地區乃具備了雙重重要性：它不但是心臟地帶的第一個邊緣保護點，同時也是發揮其重要影響力的一個前進基地；而遠東地區屬於蘇俄惟一能發揮其海權力量的戰略地帶，此點更是具有特殊的意義。在理論上，高希柯夫認為未來海軍的目的在於攻擊陸上目標，同時潛艇與海軍航空隊的作戰潛力亦值得特別重視，尤其認為由於蘇聯潛艇與水面艦隻之間可以同時在同一水域中合作，此不但彌補了蘇聯地理上的缺陷，而且也增強了潛艇的作戰效率^⑭。另外，在實際上：太平洋艦隊與北方艦隊是蘇俄海軍中唯一配置核子潛艇的兩大艦隊，而太平洋艦隊已在日本海方面取得絕對優勢（見附表一），且在太平洋水域中的活動與能力，亦已有顯著的

註⑬ Ray S. Chinn, *op. cit.*, pp. 10, 22.

註⑭ Sergei Gorskoy,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op. cit.*, pp. 26-28.

增加^⑤。若進一步將上述理論與實際活動相結合，則可推論出，蘇聯已將遠東地區的海權基地列為其東亞戰略部署上的重點，且以圍堵中共與嚇阻中共核子冒險為首要任務。附屬於此項任務之下的，是取得戰略先制位置，以排除美國或日本與中共聯手對付蘇俄的可能，加強對中共四周各國的影響力，並截斷中共藉擴充商運以與遠國間作政治、經濟聯繫的策略。換言之，這三項附屬任務均屬於對中共戰略設計的反制行動。^⑥

表一··

國	別	總噸位	潛水艇	航空母艦	水面艦隻	飛機
蘇	太平洋艦隊	一二〇萬噸	(原僅四〇艘)	〇	四〇〇艘	三五〇架
美	第七艦隊	六〇萬噸	五艘	二艘	五五艘	四五〇架

(來源：日本世界週報，一九七六、三、廿三，第十四頁。)

蘇聯太平洋艦隊係以海參崴、蘇維埃港 (Sovietskaya Gavan) 與彼得羅巴夫洛夫斯克 (Petropavlosk) 為主要據點。三者以蘇維埃港為三角形頂端，南北分別為海參崴與彼得羅巴夫洛夫斯克，恰好形成一個扇形，籠罩著鄂霍次克海及日本海。海參崴是蘇聯在遠東最重要的軍事基地，在戰略上，其主要的弱點係一旦戰事發生，將完全暴露在他國的監視之下，而且港口亦可被水雷封鎖。為彌補此一缺陷，蘇聯乃於一九五七年七月廿一日，不顧各國反對，將大彼得灣劃入內海，以圖們江口 (Tumenula R.) 至波伏羅特尼岬 (Povrothnyi Cape) 之間的一〇八英哩為界^⑦。蘇維埃港為潛艇基地，由於韃靼海峽 (Tarta Strait) 與庫頁島 (Skhalin Is.) 的天然屏障，故其戰略位置頗為重要。彼得羅巴夫洛夫斯克乃堪察加半島的首府，是北太平洋上的最大潛艇基地，由此開航的

註⑤ See Tan Su-cheng, *op. cit.*, p. 5; David Rees, *op. cit.*, pp. 7-11; 小谷秀二，「失レヤタ『日本海』」，時事週報，五七卷，十二號，一九七六年三月廿三日 (東京：時事通信社)，第十一—十五頁。

註⑥ 鈕先鍾曾以中共對蘇聯的反制戰略應用係受中國古代戰略思想所影響將之歸結為三個原則：以夷制夷、遠交近攻、避強擊弱。Romance 予以引伸並借用 Scott Borman 以「圍棋」解釋中共反制行動的說法，對蘇聯與中共的海權鬥爭作系統的說明。Shen-chong Nieu, 'Future Trends of Communist China's Strategy Policy, "NATO's Fifteen Nations, June-July 1974 (Amsterdam: Jules Perels' Publishing Co.), p. 54, and Francis J. Rommance, 'Peking's Counter-Encirclement Strategy: The Maritime Element, "ORBIT, Vol. 20, No. 2, Summer 1976, pp. 439-450.

註⑦ 'Decree of the USSR Council of Ministers Regarding Peter the Great Bay' in William E. Butler, *The Law of Soviet Territorial Water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7), pp. 108-109.

潛艇可以直接攻擊美、日兩國綿延五百英哩的主要太平洋運輸帶¹⁸。據報導，目前蘇聯太平洋艦隊司令部已部分遷移至此地，四週並部署了新型飛彈，因此可以想像到，此港的戰略價值目前已大為增加。蘇聯海軍由以上三個據點出發，並以日本海為中心，再配合其日益增強的海事活動與空軍力量，不但能够超越的美國海軍現有實力，並且可以逐步達成其建立控制的戰略要求。基於此一分析，則蘇聯太平洋艦隊快速成長的事實，就不會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了（見表二、三、四）。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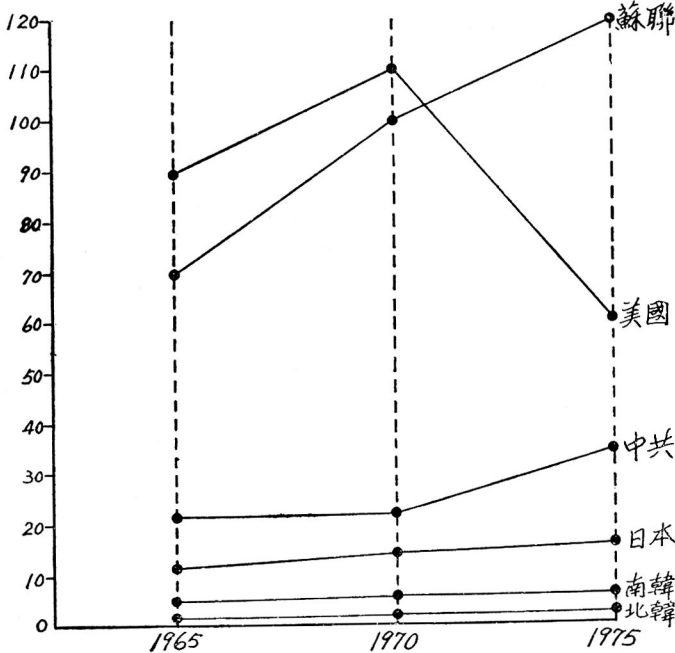
1965-1975 遠東海軍情況

國別	年份	1965 (單位：噸)	1970 (單位：噸)	1975 (單位：噸)
蘇聯 (遠東)		700,000	1,000,000	1,200,000
美國 (遠東)		900,000	1,100,000	600,000
中共		210,000	210,000	350,000
日本		112,000	139,000	168,000
南韓		57,000	70,000	78,000
北韓		15,000	14,000	44,000

(來源：一九七六年日本國防白皮書，第十七、一四八頁。)

表二：成長量比較

表三：成長幅度比較 (單位：10,000噸)



表四：蘇聯太平洋艦隊實力

艦別	數量			
	A	B	C	
巡洋艦	6	10	10	
驅逐艦	27	80	80	
潛水艦	92	120	125	
小型戰艦	OSA級飛彈快艇	58	35	310
	掃雷艇	100	100	
	登陸艇	38	38	
	河海巡邏艇	40	40	
	反潛小型驅逐艇	25		
	高速護航艦	31		
魚雷快艇	40			
輔助船	情報船	15	15	240
	補給船	7		

資料來源：A: *Jan's Fighting Ships* 1975-1976, p. 549.

B: R.D.M. Furlong, "China's Evolving National Security Requirements,"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 April 1976, p. 558.

C: *Japanese Defense White Paper* (Tokyo: Japanese Self-Defense Agency, 1976), p. 148.

除以上三個基地之外，日本海附近的島嶼與海峽亦為蘇聯海軍企圖控制的對象。大韓（Korean）、對馬（Tushima）、津輕（Tsugaru）與宗谷（Soya）等海峽，蘇聯將之視為太平洋艦隊的通道。宗谷海峽寬約廿海里，介於北海道與庫頁島之間，其中十海里為蘇聯控制，該海峽對蘇聯海權活動並不構成阻礙。其餘三海峽則分屬南韓或日本。津輕海峽寬僅十海里，位於北海道與本州之間。對馬海峽與大韓海峽以對馬島東西分開。目前蘇聯在這些海峽的活動頗為活躍，據估計，由一九七一至七六年間，蘇聯通過對馬海峽、宗谷海峽與津輕三個海峽的年平均次數分別為一三一次、一一四次與五三次，總平均次數每年為二九八次。此外，蘇聯並不斷對日本作漁業侵擾與軍事演習，或以軍機闖入日本領空②。

註② David Schilling, "A Reassessment of Japan's Naval Needs," *Asian Survey*, Vol. XVII, No. 3, March 1976, pp. 227-238.

註③ 據報導，一九六五年以來蘇聯太平洋艦隊火力成長三倍，一九七五年十月日本防衛廳報導，在過去十個月之中，蘇聯太平洋艦隊戰艦由五四艘升至七五艘。See Tan Su-cheng, *op. cit.*, p. 26.

註④ 坂本德松、甲斐靜馬，返也北方領土（東京：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七年五月卅一日，第一版），第一八六頁。

註⑤ 據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朝日新聞報導，自一九四六年四月卅日第一艘日本漁船曉丸號被扣起至一九七六年九月卅日止，共有一千五百卅一艘漁船及一萬二千七百廿六名漁民被蘇聯扣留，其中74%在北方四島附近被扣押。蘇聯漁船則常常藉口氣候不佳，要求入日本港口停泊，且常久留不去，當然其探勘船及漁船不斷侵入日本水域更不在話下。日人認為其目的均在作情報偵察及海道測量。關於其軍事演習以一九七五年為例，該年度內共有四次：①大洋二號（OKEANI）演習，蘇聯四艘軍艦環繞日本巡行；②活動於鄂霍次克海與日本北端；③由一百英哩外朝日本東端前進；④範圍擴至卡洛林島與非島之間。又據日本統計，一九

蘇聯在日本海及印度洋海權的擴張

七五年間由於蘇機之侵入而日機被迫升空的次數共二百八十一次，平均每月廿三點一次，若與過去十年間之次數合計，則平均每月廿八次以上。此種行為日本判定主要在刺探日本反應和美國海軍配置。見坂本德松、甲斐靜馬，全前引書，第八〇——八二頁。Tan Su-cheng, *op. cit.*, p. 39; David Rees, *op. cit.*, p. 12. 小谷秀二，全前註，第十五——十七頁。

就蘇聯觀點言，如果以上海峽與北方四島為日本所控制，則將使蘇聯太平洋艦隊的作用大為減低，從而失去其主動性。因此蘇聯堅持它對四島的主權和在上述四海峽的自由通航權。目前蘇聯在這方面的作法是，對四島問題絕不妥協，並且將擇捉島的單冠灣（昔為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基地）作為停泊港口，開闢國後島的東湧和擇捉島的天寧為軍用機場。對於自由通航的看法，蘇聯的觀點認為，公海上的自由通航權應適用於國際海峽。一九七二年七月，蘇聯並提出具體主張，即國際海峽的自由通行條件，包括演習、發砲、使用武器、自軍艦上起飛飛機、水路測量、空中照相、船舶回轉或緊急潛水以及軍機燃料補給等等。果如此，則將使日本對國際公法「無害通過權」的解釋產生困難^②。由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卅日，日本國會主張將領海擴大為十二海里，則津輕、宗谷、對馬三海峽均納入日本領海。據目前國際法之規定，國際海峽如劃歸領海，可以適用無害通過權，沿岸國不得阻止，但所謂「無害」係指：「不違害沿岸國家的和平、秩序或安定」，而其判斷則由沿岸國解釋。目前由於蘇聯在事實上的諸種海上示威行動已頗使日本引以為憂，倘若蘇聯的要求再被接受，則必將使日本對於無害通過權的解釋變得毫無彈性，而完全暴露蘇聯海軍力量威脅之下。

三 蘇俄在印度洋水域的活動

印度洋是蘇聯擴張海權的另一個着重的焦點，高希柯夫曾經以日俄戰爭為例，解釋俄國之所以失敗乃由於當時控制在英國手中的這條「印度之道」，無一處允許俄船泊錨或補給，甚至還使俄艦被阻截於外國港口而不得急馳赴援^③。衡諸此一解釋，再瞭解蘇聯北方航線使用的不方便，當可使人得到一種印象：即蘇聯對於印度洋的爭取乃是歷史的一部分，其主要目標在於削弱西方據點，而為東亞地方的爭奪作準備，復以圍堵中共、截斷中共與第三世界沿海各國的關係，以及擴張蘇俄本身的影響力為重要任務。

印度洋可以概分為七個次區^④，其中以南亞次大陸最具戰略價值，也是蘇聯注意的重點。以下的討論將以此一區域及東南亞一帶為主。

註② 日本的困難是：(1) 同意蘇聯的主張，倘若蘇聯核子艦隻的通過，則會破壞日本非核子政策；(2) 若欲禁止，則日本又不能違背安保條約而拒絕美艦的通過。為此日本政府曾計劃把對馬、津輕海峽排除在外，另定一套「特別模式」(exception formula) 為變通之依據，但如此做又將引起其他的衝突。See Kazumi Ouehi, "Japanese Perspective of the Law of the Sea,"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 of the 71st Annual Meeting*, April 21-23, 1977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pp. 161-162.

註③ Sergei Goshkov, "Navies in War and in Peace,"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 100, No. 3, March 1974, pp. 59-60.

註④ 七個次區域分別如下：(1) 澳紐區，(2) 東南亞區，一旦克拉(Kara)運河開通將可聯結印度洋與暹羅灣，此區之戰略重要性將因而增加，(3) 南亞次大陸，(4) 波斯灣，(5) 紅海至亞丁灣，(6) 莫三鼻克海峽以北，(7) 莫三鼻克海峽以南。

一九六六年一月，蘇聯飛彈軍艦普拉閔尼亞號（Plamenny）進入紅海，在衣索匹亞的馬索望港（Massawa）作短暫訪問^⑧。一九六七年蘇聯艦隻進一步涉入印度洋擔任收回太空艙任務^⑨。經過以上兩次試探性活動之後，一九六八年即有正式艦艇駐泊於印度洋，自此蘇聯海軍的活動即直線上升。據統計，一九六八年蘇聯艦隻的「存在係數」（Presence Coefficient）為一八〇〇，一九七一年增至三四〇〇，一九七二年印巴戰爭時急遽增加至八八〇〇，翌年增至九〇〇〇。五年之間增加五倍，其情況非比尋常^⑩，倘若再進一步由以下兩項資料觀察，不難獲得蘇俄艦隻在印度洋活動的更明確的印象：（一）月增加量：一九六八年時為二〇，一九六九年為三一，一九七〇年為四四，一九七二年為四二；（二）一九七一年為活動最規律的一年，該年前半年蘇聯艦艇平均活動量為四，下半年為二（一月及七月除外）；（三）一般蘇艦活動上半年較頻繁（見表五、六）。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印巴第三次戰爭爆發，蘇聯派遣克里斯塔型（Kresta）與基達型（Kynda）飛彈巡洋艦進駐孟加拉灣，抗衡美國以八萬九千噸級核子航艦企業號為主所組成之特遣隊，使美國所採取的「砲艦外交」失敗；爾後，蘇聯在印度洋之軍艦即平均維持在廿艘左右，在印度洋上產生了實質的影響力。

表五：蘇聯艦隻在印度洋年活動量

年 份	水面艦隻	潛 水 艇	輔助航隻	總 額
1968	6	2	6	14
1969	7	3	10	20
1970	10	7	12	29
1971	10	1	7	18
總 額	33	13	35	81

（來源：“Joint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 o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Australian Federal Parliament, in Geoffery Jukes, *The Indian Ocean in Soviet Naval Policy*, p. 15.）

表六：蘇聯艦隻在印度洋月活動量

	1968	1969	1970	1971	總 額
一 月	0	3	6	6	15
二 月	0	3	2	4	9
三 月	3	3	2	4	12
四 月	3	3	5	4	15
五 月	2	1	8	4	15
六 月	2	1	5	4	12
七 月	2	1	2	5	10
八 月	0	2	2	2	6
九 月	0	4	2	2	8
十 月	0	4	2	2	8
十一月	3	3	4	2	12
十二月	5	3	4	3	15
總 額	20	31	44	42	137

（來源：同上第16頁）

註⑧ Geoffery Jukes, “The Indian Ocean in Soviet Naval Policy,” *Adalphi Paper*, No. 87, May 1972 (London: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p. 25.
 註⑨ Raori Kaul, “The Indo-Pakistani War and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Indian Ocean,” *Naval Review* (Annapolis, Md. U.S. Naval Institute), 1973, p. 179.
 註⑩ Tan Su-chang, *op. cit.*, p. 59. 趙倩譯，「蘇俄與亞洲的和平——以匪俄對立為中心」，中共研究選譯（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第四期，六十三年七月，第五十四頁。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蘇聯出版的「國際事務」雜誌中，曾刊有一篇討論印度洋的文章，其內容頗能印證蘇聯的態度。該文重點在伸述蘇聯承認印度洋為其對遠東方面運輸的孔道，不過蘇聯目前在印度洋的活動都僅止於補充物資，同時是依據國際公法原則而活動。相反的，美國在第亞哥加西亞（Diego Garcia）增建海軍設施，實係針對蘇聯，乃一種「帝國主義」為奪取經濟、政治戰略利益的作風，而中共則為鼓勵美國如此作的要角。因此，蘇俄認為，為了要使亞洲人民獲致安全與和平，應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布里茲涅夫訪印時的宣佈為努力的方針，即：「雙方應與所有利益相當的國家，基於平等的基礎，一起在把印度洋變成為和平區域的這一問題上，尋求完美的決定。」而此舉將是蘇聯亞洲安全體系理想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②。

印度洋——蘇彝士——紅海之間通道的暢行無阻，可以使得蘇聯遠東區與黑海連結。假若蘇聯能如前所暗示的，在印度洋區域排除美國的箝制和中共的染指，促使自身在半真空狀態下建立一支有效的海權力量，則必然會在平時增加其發言權，有利於蘇俄在東亞的發展；在戰時則可縮短地區的反應時間，而有效地阻斥西方對波斯灣石油的使用，並進一步在亞洲地區獲取更大的感應力量與戰略實質利益。基於此一了解，印度洋之戰略重要性及其潛在之衝突乃一不容忽視的事實。

四 對西方式標準判定蘇聯海權力量的評估

前德國海軍少將華格納（Edward Wagner）曾以艦艇數與位置的乘積作為海權的判定標準（ $SP = F \times P$ ），其中如果有一項為零數值，則不構成海權的條件。根據這個標準，華格納判定蘇聯由於無充分的海軍戰略位置（Naval Strategic Position）^③，因此不足以構成海權力量，至多亦祇可說其具有海事權（Maritime Power = Maritime Force \times Maritime Position）而已^④。華格納認為，蘇俄的戰略目標仍屬「海事戰略」的目標，即繼續不斷取得新的「海事」位置，務期一旦戰爭發生時，能將之轉變為「海軍」戰略位置。華格納並進一步分析，蘇聯因為尚缺乏一個「力量充分的艦隊」，在印度洋不能構成海權。而在太平洋方面，只要西方能夠區域性地運用制海權，則蘇聯亦無法將「海事」位置轉變為「海軍」戰略位置。因此，華格納認為未來蘇聯海軍可能的發展是：（一）在海洋區域採取守勢；（二）在內海及周界海域則採取攻勢，目的在推進位置，以擴張其控制區域，方式有二：（一）海陸並進，以推進

註② From V. Kudryavtsev,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Plans of 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November 1974, pp. 114-118.

註③ 華格納界定海軍戰略位置條件：（1）確定艦隊可由此出動，（2）具有艦隊保護、修養及補給措施，（3）必須有妥善之保護，防禦陸空攻擊，（4）必須有無法切斷的充分的交通線，並和本土相連，（5）海外基地須安全地在己方控制之下。其分析波羅的海與黑海為內陸水域，通路在北約控制之下；巴倫支海和日本海為狹隘水域，為大洋隔開的周界水域，從海權上研判，此位置之「值」不是很微小便是等於零。而蘇聯艦隊又彼此隔離，只要西方艦隊存在，則蘇聯仍侷限於周界海域，在戰時無法集結，所以其艦隊「值」亦為零。見黃志潔譯，「核子時代海軍戰略」，戰略專論選輯（台化：國防部史政局，民國六十二年七月一日），第四一—四十七頁及八十一頁。（原序：Edward Wagner, "The Theory of Naval Strategy in Nuclear War."）

註④ 海軍權即海軍在場（Maritime presence）或海事措施（Maritime Measure），其程度之判定以艦艇數和泊錨港灣之數目、地點及優劣來度量，以此發展之海軍戰略為次要之海軍戰略，其與海權關係甚大，隨時可以轉移至以攻擊為目的的海軍戰略，換言之，其平時屬於政治階層，戰時則屬於軍事階層。見黃志潔譯，空前引書，第七四—七九頁。

其海軍戰略位置並建立一支與美國勢均力敵的艦隊；(二)建立一支由潛艇組成之攻擊艦隊，條件是製造速度高於西方之目前所擁有者，如此，方能成爲具有高度「艦隊」因素價值之海軍工具。依華氏觀察，在北冰洋及遠東的位置可以施行此種戰略，而不必推進其位置即能採取一種海軍攻勢戰略，以奪取海上霸權^⑳。

對於以上之部分見解，作者個人持有另外的意見。第一是關於地理位置的缺陷與大量集結艦隻的論斷。高希柯夫雖曾承認蘇聯的弱點，但他認爲由於核子潛艇的廣泛使用以及水面艦隻與潛艇可以在同一水域同時作業，已大大減低了陸上基地的重要性。同時，由於目前乃以攻擊陸上目標爲第一考慮，因此已使得海上互擊的作用減低；此外更由於彈導飛彈的使用，亦改變了船艦的性質^㉑。第二、據赫德遜(G. E. Hudson)的分析，蘇聯海軍發展的一個特點，簡言之即「均衡」與「阻斥」，這兩種觀念都和西方大有差異。蘇俄海軍追求「均衡」之目的，並不在於使其所有的艦艇型式均與美國一致，而是追求其本身的傳統與核子作戰能力的平衡發展；蘇俄海軍建立「阻斥」觀念之目的，亦非西方的「海上主宰」(Command of the Seas)的觀念，而是在於控制作戰行動的區域(operational area)，以使其可以對現存之西方海權造成挑戰及阻斥，不使海洋被西方國家所壟斷^㉒。此外，蘇聯目前所着重者，實爲建造重裝艦隻及先制攻擊(first strike)的海軍。㉓。根據以上兩項分析，可以了解蘇聯海軍並不以在世界海洋上全面與美爭雄爲主，而是在於困擾其對手；其海軍發展亦不在於建立一隻與美國勢均力敵的大型艦隊^㉔。在以上所述目標之下，「海軍」戰略位置在蘇聯整個海權上即不構成爲絕對性不利的條件。第三、就太平洋與印度洋而言，即使我們在直接的軍事方面可以低估蘇聯的能力，但是在政治方面却不能輕視其影響力；尤其當國際危機發生時，美國的「選擇自由」已受到了限制，且在戰事爆發之前，由於蘇聯海軍阻斥功能的發揮以及其經由船團對兩洋沿岸開發中國家的影響，已使西方國家蒙受許多利益上的損失^㉕。這絕非美國海軍嚇阻或示威行動所可挽救的，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美國在印巴戰爭中的頓挫，可爲明訓。

蘇聯在東亞地區從事海權力量的追求是多元的，其目標則係附屬在它的全球戰略設計之下，即在摧毀敵人的陸上基地，並充分發揮海上「阻斥」的功能。因此，我們對於蘇聯海權的發展不能以西方的觀點和標準來予以低估，更不能忽視蘇聯藉着海事活動對第三世界增加影響力，以及藉安全與和平的口號來排除西方勢力所作的遠程設計。

註⑳ 黃志潔譯，全前引書，第八二—八七頁。

註㉑ Sergei Gorskoy,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op. cit.*, pp. 26-29.

註㉒ George E. Hudson, *op. cit.*, pp. 105-111.

註㉓ William Schneider, Jr., *op. cit.*, p. 99.

註㉔ 關於這方面 Osgood 亦有類似之看法。See Robert E. Osgood, "The Reappraisal of Limited War," in *Problems of Modern Strategy*, p. 117.

註㉕ 一九六五年三月廿七日貝加也夫曾爲文闡釋蘇聯之船團政策，係在於同資本主義船團競爭以限制侵略性國家並給予開發中國家經濟和外貿上的支助。此即貝加也夫主義(Bakayev Doctrine)。根據此一主義及高希柯夫所有海事活動皆爲蘇聯海權一部分的主張來看，即可察覺蘇聯船對西方所造成的困擾和損失是屬於全面性的，並且就整個海權而言，這也是一種海上阻斥行動。See David Fairhall, *Russian Sea Power* (Boston: Gramhic Incorporated, 1971), p. 119.